

PEREGRINAÇÃO

FERNÃO MENDES PINTO



上冊

金國平
譯

Tradução de Jin Guoping

遠遊記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

遠 遊 記

(上冊)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 著

金國平 譯註

葡萄牙大發現紀念澳門地區委員會

澳門基金會

澳門文化司署

東方葡萄牙學會

遠遊記 上冊

作　　者：費爾南・門德斯・平托

譯　　者：金國平

中文校對：徐　新

封面設計：馬偉達

出　　版：葡萄牙航海大發現事業紀念澳門地區委員會
　　　　　　澳門基金會

　　　　　　澳門文化司署

　　　　　　東方葡萄牙學會

版　　次：1999年6月第一版

印　　數：3,000本

排　　版：新藝電腦植字有限公司

印　　刷：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譯者序言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於一五一四年左右出生於舊蒙特莫爾(Montemor-o-Velho),一五三七年至一五五八年間曾漫遊東方,一五五三年至一五六年間入耶穌會^①。按當時該教團的規定,在此期間於同會成員有多份通信,其中較著名的便是一五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從滿刺加寫給葡萄牙耶穌會修士的信^②及一五五五年十一月廿日發自亞馬港的“平托修士致果阿耶穌會學院院長巴爾塔札爾·迪亞斯(Baltazar Dias)^③神甫信函^④”。

二十一載滄桑中“……曾十三次被俘,十六次被賣。”“上帝保佑,我於一五五八年九月廿二日平安無恙地回到了里斯本港。那時統治國家的是剛剛過世的女王唐娜·卡塔利娜。我向她呈交了從印度總督那裡帶來的信,向她講了許多有利於我的話。她把我的事情打發給當時一個專管此類事情的軍官去辦理。當時經辦人對我說了許多好話,給了我許多希望。那些可憐的紙張在我手中保存了四年半。四年半後,我未得到任何好處,祇是費了不知多少精力,東申請西申請。實不知是這四年半更艱苦,還是那些流浪漂浮的歲月更艱難。”他於一五八三年二月三日獲得國王費利佩三世所敕令的“兩莫約^⑤小麥”年俸,同年八月七日卒於里斯本對面的阿爾馬達(Almada)的普拉加爾(Pragal)。

晚年時,他感到餘日無多,開始憑記憶撰寫其漫遊東方的經歷,“草成拙作,傳世後人^⑥。”手稿約成於一五七六年,一六零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提交宗教裁判所審查,直至一六一三年六月十六日纔獲印刷令,一六一四年葡語初版付梓。此書問世後在歐洲不脛而走,各種譯文紛紛面世。一六二零年出現了西班牙語本,一六二五年英語摘譯本付梓,一六二八年法語本問世,一六七一年荷蘭印刷了荷蘭文譯文,一六七一年德文版刊行。此外尚有一拉

丁譯文^④,但未印行。意大利文本刊行於十八世紀。本世紀尚有瑞典文、捷克文、羅馬尼亞文及日語譯文發行。據不完全統計,從《遠遊記》問世以來,計有各種世界主要語言的全、摘譯本一百七十種之多。因此可以說,本書不僅在葡國文學史上,而且在人類文學遺產中亦有一席之位。

全書結構如下:第一章:引言;第二章至第三十六章:從印度洋至巽他群島;第三十六章至第七十九章:安東尼奧·德·法利亞的行蹤;第八十章至第一三一章:穿越中國;第一三二章至第一四三章:首次抵達日本;第一四五章至第一七一章:出使琅勃拉邦;第一七二章至第一九九章:巽他群島及暹羅;第二零零章至第二一八章:聖方濟各及二、三次抵達日本;第二一八章至第二二五章:陪伴貝爾喬爾大師及四次抵達日本;第二二六章:結語。

譯者在里斯本大學文學院就讀時,首次開始此書的研究,遂為其奇偉所折服。後積十餘載寒暑之功將此鴻篇鉅著漢譯^⑤並附之詳考,以奉獻廣大漢語讀者。本文據薩·達·科斯達(Livraria Sá da Costa Editora)出版社書店所刊行的一九八一年第二版及一六一四年初版譯出。注釋部份參考了麗貝卡·卡特絲(Rebecca Catz)的英譯本,沙海昂(Antoine Joseph Henri Charignon)的法文節譯注釋本^⑥,以及某些研究專著。文中不逐一標注,在此一並說明。

研究期間,我們得到了葡萄牙古本江基金會(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及葡萄牙語言文化學會(Istituto de Cultura e Língua Portuguesa)的贊助。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司署和東方葡萄牙學會聯手刊行中文譯本,使我們一個從負笈求學時代開始的夢想成為了現實。譯者衷心感謝所有支持過此項工作的機構與個人,特別要感謝的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主席沙華士先生(Comandante Rui Vasco de Vasconcelos e Sá Vaz)、澳門基金會主席盧德奇先生(Dr. António Rodrigo Júnior)、澳門文化司署司長王增揚先生(Dr. Wang Zengyang)及東方葡萄牙學會主席林寶娜女士(Dra. Ana Paula Laborinho)。最後,譯者向黎祖智博士(Doutor Jorge Rangel)、高樹維先生(Dr. António Manuel Salavessa da Costa)、魏祖澤先生(Dr. José Ângelo Lobo do Amaral)及吳志良博士(Doutor Wu Zhiliang)尤致謝忱。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這個名字在中國並非完全陌生。中國澳門史學者在涉及澳門開埠史時常有涉及，但大多使用的是從其它文種轉譯的片斷。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僅通過譯文而得知的部份內容，欲對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涉及的中葡關係史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如填塞雙嶼港、葡人在廈門灣一帶[®]的貿易暫居地的消失及澳門開埠等問題進行翔實、深入的研究是有困難的。《遠遊記》雖不是一部史書，但它從文學作品的角度為歷史研究提供了不見於當時著名海外發現編年史作者筆下的許多寶貴史料，例如雙嶼港被毀的原因、葡人被逐出福建的導因及澳門的起源。因此，被列為遊記文學作品的《遠遊記》，對於研究明代中外交通史、葡萄牙人入華史，乃至明史本身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

平托記述了雙嶼被毀的原因：

“我主大慈大悲、大恩大德，保佑這個地方比雙嶼還要安全，存在的時間更長。雙嶼，我在前有詳述，它是距此向北二百多里格遠的一個葡萄牙人的村落。因一葡萄牙人的胡作非為，雙嶼在片刻之內被摧毀、夷為平地。我親身經歷了這場災難。當時我們的人力及財產損失無法估計。因為當時那裡還有三千多人，其中一千二百為葡萄牙人，餘為其它各國人。據知情者講，葡萄牙的買賣超過三百萬金，其中大部份為日銀。日本是兩年前發現的，凡是運到那裡的貨物都可以獲得三、四倍的利錢。

這村落中除了來來往往的船上人員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議員、死者及孤兒總管、度量衡及市場物價監察官、書記官、巡夜官、收稅官及我們國中有的各種各樣的手藝人，四個公證官和六個法官。每個這樣的職務需要花三百克魯札多購買，有些價格更高。這裡有三百人同葡萄牙婦女或混血女人結婚。有兩所醫院，一座仁慈堂。它們每年的費用高達三萬克魯札多。市政府的歲入為六千克魯札多。一般通行的說法是，雙嶼比印度任何一個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壯觀富裕。在整個亞洲，其規模也是最大的。當書記官們向滿刺加提交申請書和公證官簽署某些契約時，都要說‘在此忠誠的偉大城市雙嶼，為我國王陛下效勞’。

現在既然說到這些了，我來講講如何及為甚麼這個著名、富有的村落會消失。事情是這樣的：

那裡有一個出身高貴、正直的人，利馬橋人氏蘭薩羅特·佩雷拉。據說，此人賒給了幾個不講信用的華人價值一萬克魯扎多的次貨。他們提走了貨物，但未付錢，再也沒有露面。所以他想從那些沒有欠他錢的人身上挽回這筆損失，於是糾集了十五、二十個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葡萄牙人，甚至更差的人，於一天晚上襲擊了距那裡兩里格遠的一個名叫西帕通的村子。在那裡搶劫了住在那裡的十幾家農戶，搶了他們的妻子，毫無理由地殺死了十三個人。這件惡事第二天很快就在當地傳開了，居民到主管法律的總兵那裡去告狀。為此立了專案，將民訴寫了狀子（當地話叫 macalixau）遞呈到政府巡按御史。這一官職如同總督。他立即派了一位如同我們海軍上將的海道，率領一支由三百艘中國大帆船及八十艘雙桅帆船，六十萬大軍，在十七天內做好備戰工作。一天清晨，這一艘隊向葡萄牙人的村落發動了攻擊。說實話，我才疏學淺，無能全面敘述事情的經過，任由人們去想像吧。我親眼目睹了這一切。在這不到五個鐘頭的上帝對我們的嚴厲懲罰中，上帝以其萬鈞之力摧毀了一切，一切被付之一炬，夷為平地。基督徒死亡人數達一萬二千人，其中八百名葡萄牙人。這些人分別在三十五艘大船和四十二艘中國帆船上被活活燒死。據說，僅在白銀、胡椒、檀香、荳蔻花、核桃及其他貨物上就損失了十五萬金。這一切不幸都是由一個貪婪的葡萄牙人的不軌行爲所引起的。此外，還有一件更壞的事情。從此，我們在當地名譽掃地，根本無人願意同我們打交道，說我們是披著人皮的魔鬼，是上帝在懲罰罪人時造出的怪物。”

關於漳州葡萄牙人居留地的消失及爾後的“走馬溪之役”，平托回憶說：“此事發生以後兩年，葡萄牙人欲重新在一個名叫漳州港口建立一村落做買賣。那個地方亦在中國，位於雙嶼下方一百里格處。當地的商人因為可以得到許多好處，他們用重金賄賂買通了當地官員，讓他們對此採取默許的態度。在大約兩年半的時間內，我們在此和當地人平安無事地做著買賣。後來在滿刺加城防司令西蒙·德·梅洛的命令下，來了一個名叫阿伊雷斯·博特略·德·索扎的人。此人同蘭薩羅特·佩雷拉為一丘之貉。他受城防司令西蒙·德·梅洛之命來漳州任該港的艦隊司令及死者財務總管。據說，此人來時發財心切。人們說他不擇手段地染指一切。當時有一個亞美尼亞人來

到了漳州港，衆人一致認為他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

此人有十幾萬克魯扎多。因為同我們一樣是外國人及基督徒，他離開了來時乘坐的那艘異教徒的船，改乘一名叫魯伊斯·德·蒙塔羅耀葡萄牙人的大船。他在此平安無事居住了六、七個月。正如我們所說，他是個好人、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一直得到衆人的寵信和歡迎。後來他發了高燒，不幸病終。在其遺囑中留言說，他的妻室、兒子在亞美尼亞一個名叫加博冷的地方。他的一萬兩千克魯扎多財產，其中兩千贈給滿刺加仁慈堂，供為他做彌撒使用，其餘的錢，他要求仁慈堂的值理及兄弟們替他保存，然後交給他的子女們。如果其子女都不在人世了的話，由仁慈堂作為其這筆財產的全權繼承人。這位基督徒剛一下葬，作為死者財務總管的阿伊雷斯·博特略·德·索扎馬上封存了他的財產，根本未做清點和其它類似的工作，說甚麼必須叫他那些遠在兩千里格以外的亞美尼亞的子女來認領這筆財產。首先他們要經過他的問話，看看他們是否有甚麼不可以得到這筆遺產的事情。

這時又來了兩個華商，他們帶來了許多價值三千克魯扎多的絲綢、錦緞、瓷器和麝香。他們欠那亞美尼亞人的錢。死者財務總管封存這些人的東西並揚言那兩華人的其它財產也屬於那亞美尼亞人。據說，這樣又侵吞了他們八千克魯扎多的財產，還說他們可以到印度死者財務總管那裡去上訴，但他不可以不這樣做，這是他的職責。

我不可多講他這樣做的理由。兩個華商兩手空空地回到了他們的故鄉。他們立即帶了妻兒老小去見巡按御史。通過一份狀子，向他詳述了事情的經過。他們告訴巡按御史說我們是些無法無天的人。

巡按御史想為這兩個及以前已向他告過狀的華人作主，立即下令從今以後任何人不許與我們交往，否則格殺勿論。用這種辦法把我們困死，一時給養奇缺。以前一文丁就可以買下東西現在要一個克魯扎多。因此我們被迫去附近一些村子找食物，所以纔出現了一些糟糕的事情。那個地方騷亂起來，人人對我們怒氣沖沖，恨之入骨。十三天後，來了一支龐大的艦隊，共是一百二十艘大帆船。我們那十三艘泊在港內的大船竟被他們燒得一艘不剩，五百葡萄牙人祇有三十人隻身逃命。”

《遠遊記》對澳門亦有較詳盡、但不無誇大之處的描繪：

“第二天早晨，我們自上川島出發。太陽落山時抵達往北六里格處的另一島嶼。該島名為浪白瀨。其時葡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一五五七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①給了我們做生意。以前那裡是個荒島，我們的人把它建成了一個大村落。裡面有價值三、四千克魯扎多的房屋，有大堂、代理主教，有受俸教士、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司法官員。衆人在那裡感到非常的安全，如同在自己的家園一樣，如同該島在葡萄牙最安全的一個地方。”

談到同中國的關係，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有一由衷之言：“以上述兩件事中，我得出的結論是，似乎目前我們在中國的事情還不錯，雙方相安無事，互相信任。我認為，華人同我們和平相處的基礎是牢固、可靠的，但祇要我們像我們的先輩一樣胡作非為起來，他們就會鎮壓我們，但願上帝保佑，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澳門風風雨雨的四個半世紀，驗證了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這個十七世紀的預言。

如同在西方家喻戶曉的《馬可波羅遊記》，平托筆下的中國在許多他的同時代人看來，不過是這位旅行家虛撰的神話。就文學史的角度而言，很難對《遠遊記》做出恰如其分的分類。總體上，它被歸入海外發現文學遊記類，但其歷史價值亦不容忽視。要對書中內容哪些是作者本人所經歷的事實，哪些是道聽途說、書本知識及文學創作作一涇渭分明的區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遠遊記》一書的永恆魅力也正在於此：邀請讀者在現實（歷史）於想像（文學）交織、穿插的時間與空間中遨遊。他將對歐洲文明、政治、宗教、軍事及經濟制度的抨擊，巧妙地寓於對朱明中國“烏托邦”理想社會溢美之詞的潛層。通過佔本書達三分之一篇幅的關於中國章節，平托向我們展示的明代中國為一“烏托邦”式的理想國。通過對華夏文明的讚揚，抨擊了中世紀歐洲文化，與塞萬提斯(Miguel Cervantes)的不朽名著《唐吉訶德(Don Quijote)》及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的史詩《葡國魂(Os Lusíadas)》相映生輝。或許，此為《遠遊記》關於中國描寫最重要之意義所在。

僅以此譯本獻給曾影響了我人生的兩位二十世紀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式的“世界公民”：

加利西亞人一貝貝(Maestro Pepe, José Castelo Caramelo)；

葡萄牙－巴西人－奧古斯蒂諾(Prof. Agostinho da Silva)。

金國平

己卯孟夏誌於特茹河畔泛宅

註釋：

- ①平托脫離耶穌會的原因仍為葡萄牙史學一疑團。
- ②參見麗貝卡·卡特斯(Rebecca Catz)及弗朗西斯·M. 羅傑斯(Francis. M. Rogers)輯注《平托信札及其它文獻》，存在出版社、國立圖書館聯合出版，一九八三年，里斯本，第三十九－四十五頁。
- ③一五一四年生於里斯本，一五七一年卒於果阿。一五五三年抵達東方。時任果阿耶穌會學院院長。
- ④參見麗貝卡·卡特斯(Rebecca Catz)及弗朗西斯·M. 羅傑斯(Francis. M. Rogers)，前引書，第六十－六十五頁。
- ⑤原文為 moio。一種古重量單位，合六十阿爾克伊雷(alqueire)。每阿爾克伊雷從十三至二十二升不等。
- ⑥遵作者遺囑，其女將手稿贈送里斯本仁慈堂。手稿今佚。
- ⑦手稿存西班牙巴塞羅那一修道院中。
- ⑧《文化雜誌》一九九七年夏季第三十一期，《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集》中第一三七－一四四頁上有個別章節的選譯。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康乃馨譯叢—葡語作家叢書之十九—《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中第一三八－二四九頁上有一較長的節譯。
- ⑨沙海昂曾注釋《馬可波羅行紀》，經馮承鈞漢譯，一九三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分三卷出版。他以法文節選、注釋了《遠遊記》中有關中國部份，一九三六年由北堂刊行。
- ⑩主要是月港。
- ⑪葡語原文作 deram，亦可理解為“允許”，“讓”。關於此問題，請見金國平、吳志良《澳門起源考異—皇帝、龍涎香、澳門》(待刊)。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遠遊記》

中漫遊意義之初探

1 出版訊息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作書名冗長，故一般將其略稱為《遠遊記》。一六一四年付梓前，在讀者，尤其是祇聞其名而未見其文的讀者中引發巨大興趣。

透過本書內容，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於一五三七年三月十一日前往印度。二十一載後，於一五五八年九月廿二日返回故里。他在東方各地雲遊四海、歷盡滄桑。這便是作者歸國後在里斯本附近一莊園中潛心著書的素材。

鑑於作者於一五八三年與世長辭，據信，本書的手稿約在一五六零年至一五八零年間殺青。某些學者，如西班牙文本的譯者埃雷拉·馬爾多那多(Herrera Maldonado)在作者謝世前曾得見稿本。

本書遲遲待刊的原因尙未明晰，但可列舉兩個因素。首先，手稿冗長，未分章節，不易閱讀理解；其次，儘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曾出手相助聖方濟各大師，宗教裁判所對作者仍惡感未除。作者在種種磨難、奇遇後，由於一時的宗教衝動而加入耶穌會的行列，後又不明不白地脫離該會，仍令耶穌會對其有所懷疑。所言耶穌會之反感，除了作者姓名被從東方耶穌會修士花名冊中剔除一事外，並無它證可據。通常認為，本書中不乏他人潤字的刀痕斧跡，甚至為本書裁分章節的國王御用編年史家弗朗西斯科·德·安德拉達(Francisco de Andrada)所大肆篡改。

幾位專事本書版本源流考證的文學評論家認為，其內容曾受到刪節。我們所見略同。譬如，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通過作者一五五五年十一月廿日

致果阿耶穌會學院院長的信札，我們知道他在會時曾在澳門逗留，但對此無任何記敘。然而，亦有另一可能，即作者本人刪節了所有關於他在耶穌會中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於一六一四年初版後，在整個十七世紀洛陽紙貴，主要歐洲文字的譯本紛紛面世。一六二零年西班牙語本發表，並於一六二七年、一六四五年及一六六四年三次重刊；一六二八年法語版付梓並於一六四五年再刊；一六五二年荷蘭印刷了一荷蘭文節本並於次年發行二版；一六五三年英語本印行並於一六六三年及一六九二年兩次再版，一六七一年，德文本一年內印刷兩次。

由此可見，讀者對本書獨有情衷。不是將其作為作者創作本意的自傳，而是視其為迎合那個時代口味的歷險小說來拜讀。

從某些譯文的標題上可以看出，譯者對這一自傳體遊記將信將疑。例如，法譯本題目為《冒險遊記》。其它譯文的前言或評論亦引導讀者將本遊記視為虛幻之作。

然而，幻想產生於本書的敘述構成及它所提供的多種解釋和不同含意。

2 虛偽之作

《遠遊記》為一引人入勝的奇書。其文學評論至今未有定論並非偶然。有時幾近刻薄。斥其想入非非、欺人之談者有之；儘管其敘述不無幽渺，以顯證驗證其敘述為其親眼所見，親身所受者亦不乏其人。

本書刊行前，對本作實屬虛幻的評論已沸沸揚揚，但亦有人為其真實性大聲疾呼。如西班牙文本的譯者埃雷拉·馬爾多那多(Herrera Maldonado)在一六二零年西語初版中，曾撰文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打抱不平。

然而，似乎虛幻說甚囂塵上。素有“翻譯大師”之稱的耶穌會傳教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在其一六三零年左右著於澳門的《日本教會史》中，以此口吻評論葡萄牙人初抵東瀛一事：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其虛偽之作中，企圖以那三個(葡萄牙人)之一自居並揚言他在那條中國式平底帆船上。如同其書中其它衆多敘述，此事失實。此書與其說為一親身經歷的敘述，還不如說係一再創作，因為他試圖

冒充說無一個王國他未曾涉足，無一事件他未曾經歷。”

將《遠遊記》斥為虛偽之作，無非讓人相信它是謊言的同意詞，但應該指出的是，從陸若漢(João Rodrigues)的上述評論中，可以看到本書為一創作，亦即通過回憶—充斥失望—來再現多年前所經歷的事件。

由此而論，在通常不很貼切稱之為海外發現遊記文學作品中，本書獨一無二。海外發現遊記文學薈萃記述擴張壯舉的著作有多種。此類作品大多以航行日誌、航路記載及地理論述為其形式，描繪了新世界、其它民族的發現及航海的困難和疑忌。然而，《遠遊記》卻以自傳問世。它將真實孕於作家意識深處。

若言本書的題目與遊記主題有關，細分析之，*Peregrinação* 的宗教詞意—朝聖—暗含書題之中。因此我們認為，作者選擇這一題目不無將本書的含意及倫理說教直接提示讀者的苦心。然而，這一宗旨在天南海北的敘述鋪開後有所沖淡。

的確，儘管本書為一自傳，其主人公常常退讓其它人物出場，佔領敘述的全屏幕，他則成為一普通解說人、難友、受害者、旁觀者或從書本獲知或道聽途說他人故事的簡單敘述者。這便是《遠遊記》一書表面看來松散邏輯結構的內蘊。

然而，保持敘述結構的連貫是敘述者本人的意識。通篇二百二十六章中，根據不同的意圖，作者選擇、構織了引人入勝的奇遇，但其主要創作意圖巧妙地貫穿全文。在始尾二章中尤為突顯。《遠遊記》的宗教及反思意義在其前言及尾聲中躍然紙上。主人公除了回首曾涉足的地方外，回憶了自己的心路歷程。為發財致富，二十載後纔得以返回故里。他已不再是原來的他，判若二人。因此，通篇敘述中對發財野心所帶來的危險每有揭露。

在起首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引導全文的雙重主線：敘述遊離於對所經歷的磨難、每每抱怨時乖運蹇和由此而來的種種不幸的認識之間。“我明白並開誠佈公地承認，我的罪孽是我一生中種種磨難的根源。”

此外，作者所進行的反思浮現字裡行間，“每每回首我孩提時代及爾後青春韶華期間所經受的種種艱難困苦……”。作者以此創造了一距離效應。通過它來判斷、選擇在此距離中的親身經歷，這便是整個敘述的主線。

可以說，本書所撰述的環境多種多樣：有回憶效果、有敘述者眼光。但後者受到歐洲人閱歷的局限，對那些聳人聽聞的奇聞逸事更加大著筆墨。此外，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創作本書時，對其人生作了回顧，力圖對其懺悔的一生進行一反思並重現這遙遙萬里之途（漫遊東方後返回葡萄牙）。他選擇了其冒險生涯中種種劫難，將其作為其奇遇、冒險路途的成份。這完全體現了他冒險家加懺悔者的創作意圖：在這漫長、茫然的遠遊中曾十三次被俘，十六次被賣。主人公以此進行內心反省，從敘述情節轉入反思。

3 虛構與真實

研究結果證明，作者所聲稱的多次被俘、出賣的日期是矛盾的；某些地理概念模糊不清；距離失誤；對所引用語言的無知。因此，從本書問世以來，人們便對其敘述的真實性有所置疑。通常認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筆下的神奇經歷不過是作者的想像而已，故有“費爾南，你在說謊（Fernão, Mendes）？我是在說謊（Pinto）。”這一流行至今的戲謔語。十七世紀至今，這一定論左右了本書的評價。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將自己視為主人公，於是把歷史範疇上的主人公與通過回憶再現的想像漫遊中的人物同親身經歷了許多旅行冒險的他完全等同起來。儘管實際上講述了作者認為“所經受的種種艱難困苦”，但他以敘述者的口吻講述了他的眼見、耳聞、體驗。這一真實性是以感覺這一唯一形式加以闡述的。這便是其作品的真偽界線，即對現實的虛構。因此，他的自傳以真實的敘述構成。它是作者－敘述者同讀者建立的默契之一。

我們不可苛責敘述部份所含有的“虛構”和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刻意的創造，但考慮到文藝評論的主線，我們認為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謂的“謊言”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更是對一個時代的看法的體現。文學評論亦不無受制於時代，常常將後來歷史證明屬實的東西定為虛構。近期的研究證明，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敘述的某些親身奇遇具有歷史依據。因此，這歷史與創作的穿插不僅僅是作者－敘述者刻意“創作”的結果，而且如我們所言，是那個時代所存在的虛構與現實之間微妙界限的體現。

作者描寫的主觀意識接近離奇。它要求敘述者為其作品的真實性提供

證據。為此，除了將撰文與體驗融於一體，創造一自傳式的虛幻之作外，作者不斷地以旅行回憶者常用的那種“回想”方式引入人種學的成份——引用外語、科技信息及地名，以此證明其敘述的真實性。同樣，此種手法亦見於對時間的描寫及對已得到證實的歷史事件的零星涉及之中。但作者最常用的描寫手法為創設場景，引起讀者的共鳴。

敘述者以“我曾目睹”反復強調他是目擊者，企圖以此證實他的神奇敘述的真實性。值得注意的是，若我們考慮到，在那個時代，視覺為諸感官中最佳獲得知識的源泉——因此最具權威性，這種“真實”與場景的栩栩如生的描寫為文藝復興時代最顯著的特徵。

4 華夏“烏托邦”

《遠遊記》向讀者展現了所發現的新世界，為當時膾炙人口的佳作。它對各地、不同人種的大段描寫滿足了讀者巨大的好奇心，使他們可以暢遊他們無法涉足的地方。與其同時代作者一樣，中國最令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驚嘆不已。而且，值得指出的是，海外發現文學的特點便是運用前人的著書立說來豐富新的敘述。同樣，《遠遊記》運用了前人的敘述，如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的《中國概說(O 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他讚揚了中國官僚制度及法律。儘管二者的宗教信仰不同，而且葡萄牙早期出遊者的條件有異，他們的作品均刻畫了一個作為人類創造楷模的中國。從此意義而言，中國體現了莫爾(Thomas More)筆下烏托邦中想像的理想國，體現了文藝復興家為人創造、為人服務的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中國章節中描寫及闡述的主題具有文藝復興時代城市特點的遺痕：

- 建築的奇偉(橋梁、公路、街道、房屋)
- 土地的綜合利用
- 風俗習慣(尤其是科舉制度、禮儀及盛大的節慶)
- 扶窮濟貧
- 正義的理想

從羅馬時代起，中國被描繪為一洞天福地、豐衣足食的國度。除此形像

外，還形成了中國為一完美社會的神話。歐洲人最內心的渴望在那裡已成為現實。在這位於天涯海角的土地上，海外發現遊記文學作品重整旗鼓、不斷涌現，為十八世紀以中國為其靈感構造一正義的理想的哲學反思開創先河。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也向人們介紹了一個可引以為楷模的中國。儘管敘述者及其同伴沿大運河而上，困難重重，但仍為人類的創造所折服：長城，法院，客棧，耕地，扶病濟貧。他筆下的中國正義，正是歐洲世界人情味匱乏的烏托邦式的反照。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北京之行尚有疑問。這一情節的許多訊息不易證實。然而，除了他虛構、目睹或耳聞的故事外，沿大運河入京路途的描寫反映了作者對中國的無比推崇，引發了歐洲讀者的盎然興趣。此乃本書洛陽紙貴之緣由所在。

林寶娜(Ana Paula Laborinho)

一九九九年初夏誌於澳門

上冊目錄

中譯者序言	金國平	II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遠遊記》中漫遊意義之初探	林寶娜	VIII
第一章 啓程前往印度前，在葡萄牙王國渡過的青年時代。	1	
第二章 我如何啓程前往印度。我所搭乘的船隊的經歷。	6	
第三章 我如何從第烏啓程去麥加海峽。旅途所見所聞。	10	
第四章 我們如何離此前往馬薩瓦，然後去祭司王約翰母親的故鄉和吉爾·埃托爾要塞。	13	
第五章 我們如何離開阿爾基科港。後遇到的三艘土耳其船。	17	
第六章 城中發生的一起暴動，其原因及結果。我如何從此被帶到了霍爾木茲。	20	
第七章 乘船從霍爾木茲到印度的經歷。	24	
第八章 從喬爾到果阿的旅途見聞。抵果阿後的經歷。	26	
第九章 貢薩洛·瓦斯·科蒂尼奧在奧諾爾女王處的經歷。	28	
第十章 艦隊司令如何做出燒燬土耳其人搖櫓船的決定。事情的經過。	30	
第十一章 延繼至第二天的戰事。貢薩洛·瓦斯前往果阿。	32	
第十二章 在此期間至佩羅·德·法里亞到滿刺加發生的事情。	34	
第十三章 佩羅·德·法里亞如何接待了巴達克王派來的一位使者。二人之間的會面。	37	
第十四章 到佩羅·德·法里亞派我去見巴達克王前該事件的發展情況。我在路上的見聞。	41	
第十五章 啓程前往亞齊前在帕納儒國與巴達克王相處的日子。	44	
第十六章 巴達克王如何離開圖爾邦前往亞齊及而後發生的事情。	46	
第十七章 那天大捷後，巴達克王的其他行動。	49	